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

MAKESIZHUYI ZHONGGUOHUA
LISHIJINCHENG HE JIBENJINGYAN YANJIU

王先俊 姚宏志 张正光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C14004980

D61
33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

MAKESIZHUYI ZHONGGUOHUA
LISHIJINCHENG HE JIBENJINGYAN YANJIU

王先俊 姚宏志 张正光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航

C1691888

D61

335

责任编辑:张传开

装帧设计:丁奕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 / 王先俊,姚宏志,张正光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676-0246-5

I. ①马… II. ①王… ②姚… ③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1780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研究

王先俊 姚宏志 张正光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b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00×1000 1/16

印 张:24.5

字 数:380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246-5

定 价:48.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	1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解读	15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诠释	40
四、本书的结构安排和主要特点	54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传播	62
一、“西学东渐”与社会主义的传入	62
二、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70
三、五四前后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86
四、马克思主义引进和传播的特点及其局限	100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113
一、党的创建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	113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118
三、第一次飞跃的延伸与第二次飞跃的准备	146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167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意义	185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本土文化	185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外来文化	196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204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工程	212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212
二、党的思想路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29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力源泉	245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245
二、与时俱进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60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重大实践问题的解答	274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	284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84
二、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95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308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条件	319
一、党的领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19
二、党的理论工作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43
三、人民群众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54
结 语 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65
主要参考文献	376
后 记	389

绪 论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研究属于“史”的范畴，其要义在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行考察，而对基本经验的探讨则有着明显的“论”的意蕴，是对历史的总结和提炼。不过，要做到这些，首先则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作出解答。这是本书内在的逻辑要求，也是本书对具体内容作展开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是为全世界无产阶级、为人类解放而创立的，因而具有世界意义，是跨越时空的普遍真理，但它又是民族的，不可避免地带有的欧洲的时代特色和文化的民族特性。这样一个同时具有世界性与民族性的“主义”和“学说”，要运用到其他国家和民族，必然有一个民族化、本土化、具体化的问题。这是文化传播和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它不仅需要“中国化”，而且同样需要“俄国化”、“朝鲜化”、“越南化”。事实上也是如此。然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在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的同时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么隐讳其词（如朝鲜的“主体思想”），要么干脆批判“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如斯大林）。为什么唯有中国共产党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此作出回答，必须首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生成语境及其深刻的历史境遇作一历时性考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经历了一个过程。学术界一般认为，毛泽东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概念的第一人，李大钊

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第一人。^①这两个“第一人”的说法基本反映了历史的事实。不过，实际情况却比这一抽象的结论复杂得多。1919年8月，李大钊曾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②1920年，他又说：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③在同一时间，其他人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比如，1920年12月，刘仁静在给恽代英的信中就提出过“主义”要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在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 institutions Customs，寻求出一个适合国情而又能达到共产主义的方针来。”^④

就李大钊而言，他之所以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不久即提出“主义”与“实际”结合的想法；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较之当时的其他人，李大钊对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更熟悉，研究也更系统；另一方面则是同当时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所引发的思考有关。1919年7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认为：“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要知道舆论家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因此，人们应该“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应该“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⑤李大钊不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于是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与之商榷。李大钊认为，研究“问题”和谈论“主义”之间没有根本的矛盾，因为“一个社会

① 雷国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启示》，载《湖湘论坛》2001年第3期。

② 《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③ 《李大钊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④ 刘仁静：《致恽代英信》，载《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1921年3月15日。

⑤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载《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

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①不过，李大钊也接受了胡适的批评，即对实际的问题应认真地研究，不应含糊不清地空谈各种学说，并且“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②

与李大钊不同，刘仁静、恽代英既没有深入研究过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也没有直接参与“问题与主义”之争，为什么也有与李大钊类似的想法？实际上，这其中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鸦片战争打乱了中国社会正常的发展轨迹，在西方列强的炮舰之下，近代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挽救民族危机，中国先进分子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从林则徐、魏源的“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从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向西方学习”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主流，而且这一主流一路高歌向前。不过，这种状况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先是20世纪初年“国粹派”的出现。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等为代表的一批精通国学的学者，提出了“保种、爱国、存学”的口号，呼吁人们重视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在中西文化关系上，他们理直气壮地倡言中西“会通”和弘扬固有文化。其时，除了“新学”、“旧学”、“中学”、“西学”这些习惯提法外，人们开始使用“东洋文明”、“西洋文明”这样一些重在强调地域性文化的新概念。虽然这样的划分法并不科学，而且当时“国粹派”众多的文化主张也不合时宜，但无疑隐隐表露出“国粹派”对文化民族性以及外来文化民族化的关注。

① 《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② 《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此后，随着西方学说付诸中国实践的再次失败，人们慢慢发现，西方国家众多的“主义”、“学说”在中国并不那么灵验。这就不能不引发中国先进分子的深入思考，是不是由于国家情况的不同，再好的“主义”、“学说”在中国也不能照搬，“主义”与“实际”必须结合，按照“国粹派”的说法就是必须“会通”。由此可见，刘仁静、恽代英之所以能够提出与李大钊类似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必然，是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搬用西方“主义”结果的反思。就如著名学者张静如所指出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主义”与“实际”必须结合的意识，至“五四”前后已在不少先进知识分子中形成共识，随后，“中国化”的概念也就被提了出来。^①

1921年7月17日，郑太朴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就“中国式的安那其主义”问题给光亮的通信中指出：“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意思就是说：按照中国的社会情形，人民性情而酌定的无政府；不是贸然把西洋那个无政府学者底办法拿来胡乱装上；因为地理历史既各不同，断不能囫囵吞枣的”。“总括一句，我所认定的‘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是‘本无政府原理，参酌中国底的社会情形人民性格而成的’。”^②这里的“中国式”与“中国化”虽非同一概念，但其中的意思已很相近。

1922年，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编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说：“教会学校教育必须更加有效率，更加基督教化，更加中国化”。^③这里的“中国化”究竟是什么意思，并没有解释，但比较早地使用了这个名词。同一年，毛吟槎在一篇有关“基督教中国化”的文章中也指出：“从实际上看来，我们基督教应当改成中国化的基督教，方能拯救中国人。”^④天协则对“中国化的基督教”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什么是中国化的基督教，是指一种含有中国人精神的基督教，而且是照中国人的样式把它发表出来的。”^⑤

1924年2月，《中华教育界》第8期发表了舒新城的《论道尔顿制

① 张静如：《关于“中国化”》，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5期。

② 郑太朴：《论中国式的安那其主义答光亮》，载《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7月17日。

③ 转引自〔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年）》，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页。

④ 毛吟槎：《基督教中国化的我见》（续），载《兴华》第5期，1922年2月。

⑤ 天协：《中国化基督教的发展》，载《青年进步》第52册，1922年4月。

精神答余家菊》一文，其中说道：“此时我们所当急于预备者，不在专读外国书籍，多取外国材料，而在用科学的方法，切实研究中国的情形，以求出适当之教育方法”，“使中国的教育中国化”。^①

1925年12月，丁绪贤在《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发表《科学书籍有“中国化”的必要》一文，大谈科学书籍“中国化”的必要性，作者指出：“有了中国化的——上文所说的编辑的——科学书籍，然后科学之在中国，才是活的，不是死的；是津津有味的，不是麻木不仁的；是有实在用处的，不是纸上谈兵的；是易使人启发研究的，不是人云亦云，不会改良进步的。最后我还要说句大话，有了‘中国化’的科学书籍，然后‘科学救国’的希望，或者才有实现之一日！”^②同年，电流学社出版系列丛书，其中之一书名就为：《电报事业之中国化》。

1926年1月，由周建人主编的《自然界》于上海创刊。创刊号的《发刊旨趣》中提出：它的宗旨是实现“科学的中国化”，接着解释说：“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变做中国的佛教，这工作称为‘佛教的中国化’，科学的中国化，也是这样的意思”。^③这就是说，《自然界》决心积极地承担起在中国普及科学知识和促进科学发展的重任。

1929年，庄泽宣在《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中指出：“现在中国的新教育不是中国固有的，是从西洋日本贩来的，所以不免有不合于中国的国情与需要的地方。如何能使新教育中国化，这是一件很大的问题，很复杂的问题”。“我以为要把新教育中国化，至少要合于下列四个条件：一，合于中国的国民经济力；二，合于中国的社会状况；三，能发扬中国民族的优点；四，能改良中国人的恶根性。”^④

1931年2月，孙本文在中国社会学社第一次年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演讲，明确使用了社会学的“中国化”概念，提出“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的任务。他说：“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依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是“今后之急务”。^⑤

① 舒新城：《论道尔顿制精神答余家菊》，载《中华教育界》第13卷第8期，1924年2月。

② 丁绪贤：《科学书籍有“中国化”的必要》，载《晨报七周年纪念增刊》1925年12月1日。

③ 《发刊旨趣》，载《自然界》创刊号，1926年1月。

④ 庄泽宣：《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版，第23—24页。

⑤ 中国社会学社编：《中国人口问题》，世界书局1932年版，第19页。

1932年2月，晏阳初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①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不能依样画葫芦般的抄袭应用。必须先知道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然后始能着手于科学的系统之建设。因此我们希望本会的社会调查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之研究有其贡献。以中国的社会事实一般的学理原则，促立中国化的社会科学。必如此中国化的政治中国化的教育等之建设，乃有可能性。”^②

1932年12月，《论语半月刊》发表美国博士Tallone的《教育中国化刍议》一文，劈头就指出：“美国教育专家罗格说中国的教育太洋化了，国联特派教育调查团来中国考察的结论也说中国教育的大病在不能适合中国社会情形，所以中国的教育有中国化的必要，这是毫无疑问的。”“教育中国化的目的，除却发扬中国固有的智能道德而外，同时要社会化，养成安居乐业的国民，俾心理方面每个人都能满足。”^③

1933年3月，陈序经在《独立评论》第43号发表的《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中说：“新教育的中国化，的确是数年来一般教育家的时兴口号，而且是国内一种很普遍的思想。”作者认为：“新教育的中国化的前提，必定把现在目下的中国，当作还未达到现代化的地位……今后的中国的教育，也当然要加紧的现代化。”^④同年，周木斋在《现代化与中国化》中，分析了现代化与中国化的关系，指出：“现代化中国，中国又反过来化现代。这就是说，百年来的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中国化’的过程。”^⑤

1933年6月，张素民在《新“中国化”之创造》一文中，在历数旧“中国化”概念之弊端之后，提出要创造新的“中国化”概念。作者指出：“我之所谓新‘中国化’，既不是事事要复古，也不是事事要学西洋。我们应斟酌本国的环境，而定我们所应有的一切东西。”“改变之法……首先改变我们的为人之法，次则改变我们的事物和文物制度。这就是我之所谓‘中国化’之创造。”^⑥

1936年，陈唯实在《通俗辩证法讲话》中说：对于唯物辩证法，

① 该书由李景汉编著，大学出版社1933年版。

② 宋恩荣编：《晏阳初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③ U.J.Tallone：《教育中国化刍议》，载《论语半月刊》第6期，1932年12月1日。

④ 陈序经：《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载《独立评论》第43号，1933年3月26日。

⑤ 周木斋：《现代化与中国化》，载《社会与教育》第6卷第18期，1933年。

⑥ 张素民：《新“中国化”之创造》，载《复兴月刊》第1卷第10期，1933年6月1日。

“最要紧的，是熟能生巧，能把它具体化、实用化，多引例子或问题来证明它。同时语言要中国化、通俗化，使听者明白才有意义”。^①同年2月，宋国宾提出“旧医药科学化，新医药中国化”^②的口号。

1938年4月，艾思奇在《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发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指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语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因为没有几分（虽然很少），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是不能够获得相当成果的。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为整个并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现在我们要来这样的一个号召。”^③一个月后，柳湜也使用了“中国化”的提法。他在《战时文化》上发表的《抗战以来文化运动的发展》一文中说：“我们在理论上不仅自我的要求提高，要求世界新的文化的吸收，但同时提出了反对无原则的洋化，反对死硬的贩运洋货，我们欢迎古今中外一切人类的劳动经验的结晶的世界文化，但我们同时提出我们要融化它，要中国化它。”^④

1938年5月，周扬在《对于通俗化与中国化的一点意见》中指出：“我们的文化运动，其所以不能够深入和普遍化，不中国化通俗化可以说是主要的原因。”“我们主张中国化，并不是主张只有中国的东西才是好的，那是国粹主义者复古家的理论，和我们不相干。我们不但反对欧化，而且，正相反，我们要尽量吸收国际的特别是苏联的一切文化的果实。问题是在：我们不要把这些果实生吞活剥，我们要把它们栽植在中国土壤上，使他们变成中国的产物。”^⑤

1938年7月，胡绳在《辩证法唯物论入门》之“前记”中说：“我

① 陈唯实：《通俗辩证法讲话》，上海东方出版社1936年版，第7页。

② 宋国宾：《中国本位之医药建设：旧医药科学化，新医药中国化》，载《医药评论》第134期，1936年2月15日。

③ 《艾思奇全书》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1-492页。

④ 柳湜：《抗战以来文化运动的发展》，载《战时文化》创刊号，1938年5月25日。

⑤ 周扬：《对于通俗化与中国化的一点意见》，载《武装》第3号，1938年5月5日。

倒是极想在这本书里，于理论的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思想斗争”，这是“真正做到所谓辩证法唯物论的‘中国化’”的一个方面，“这样做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必要的”。“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这应该是所谓‘中国化’的意义的一面”。^①

除以上提到的外，还有其他人同样提出或使用过“中国化”概念。比如，1933年4月，何凝在《鲁迅杂感选集》的“序言”中写道：“自从西洋发明了法西斯主义，他们那里也开始中国化了。”^②1938年3月，张申府提出“科学中国化”的主张。他指出：“在推广科学上，更应特别注意科学法（算数的经验主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脾气。还应使科学成为中国的。不但要中国科学化，同时也要科学中国化。使中国对科学有其极特色的贡献，使科学在中国有其特殊的特色。”^③

总之，在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之前，“中国化”的概念已在知识界广泛流行。正是这种浓厚的“中国化”氛围构成了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出场语境。不过，当时人们对“中国化”仍然存在着一一定程度上的模糊不清。那些谈论“中国化”的人，或者是从教育、科学、文化的角度讲的，或者是从哲学的角度，从哲学大众化、通俗化与中国化、现实化关系角度提出“中国化”概念的。除胡绳等人对“中国化”的内涵进行了两个方面的解读外，其他人对“中国化”的含义也没有给出更多和更明确的解释。

与“中国化”这一概念逐渐被知识界提及与强化相同步，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也在成熟，并且逐渐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和认同。

自李大钊提出“主义”要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之后，1921年张太雷在《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中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主义任务，过去和将来都只有在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方法正确地运用于各国具体特点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④1924年3月，恽代英在《列宁与新经济政策》一文中指

①《胡绳全书》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②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杂感选集》，青光书局1933年版，第25页。

③《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0页。

④《张太雷文集》（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

出：“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①1927年2月，瞿秋白在为自己论文集所写的“自序”中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②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中，进一步明确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起草红四军党的九大决议关于如何纠正主观主义时指出：“（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陷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③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论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④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思想先导。

1935年遵义会议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段时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有关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更加成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

①《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0-481页。

②《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311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8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115-116页。

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比如，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分析道：“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①“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②还比如，关于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作了阐释。他引用列宁的话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而教条主义者“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③这些论述所涉及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无疑为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在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准备。

从相关史料看，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同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具体环境”和“具体条件”中去的思想有关。基于世界形势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变化，共产国际七大决定改变原先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把活动重点转移到制定世界工人运动的基本政治、策略路线”上来，而“将日常领导集中于各国支部本身”；强调“要避免机械地把一个国家的经验套用到另一个国家”，“就是苏联共产党的工作形式和方法，也不可以机械模仿，因袭抄写”；要帮助各国党学会把共产国际的路线“灵活地具体地”“应用到每个国家的特别环境中去”，毫不留情地反对“说空话，拘守成规，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313页。

咬文嚼字以及信条主义等等”恶习；要求各国党“善于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问题的武器”，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应用到各国的“具体环境中去，应用到具体条件中去”，“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季米特洛夫还在会上特别指出：“列宁曾经再三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那种给一切情况、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一个万应的药方”的观点，“等于愚昧无知”，党校不能培养“书呆子，清谈家，和引证专家”，他们“必须研究的，并不是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列宁主义的生动的革命精神”。^①当这些思想传到国内时，立即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回应。1935年12月党召开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强调，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而关门主义的思想实质是，“不会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去，而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②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去”，不能“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这一思想和李大钊的“主义”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瞿秋白的“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等基本思想是一致的。有着这样的背景和思想基础，瓦窑堡会议后，党的文献中很快就出现了将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民族化”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化”的提法。1936年3月，当时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将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③193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告全党同志书》更是强调：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原则必须使之具体化，成为具体行动的指南针”，中国共产党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决定此次大革命能否胜利的命运”。^④虽然此时党的文献中还没有明确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名词，但其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和马克思主义“具体

① 转引自鲁振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6、547页。

③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

④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

化”，已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有着非常接近的内涵。^①至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已经呼之欲出。

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这次全会，是中共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开会时间最长并由毛泽东第一次主持的中共中央全会。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②10月15日，张闻天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提纲中又提出组织工作的“中国化”问题。他说：“在组织工作中必须熟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必须严格的估计到中国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习惯的各种特点，来决定组织工作的特点，来使组织工作中国化。”^③在讲到宣传工作时，他还提出了“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④的概念。此后，党的其他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任弼时、彭真、陈毅等）和一些理论工作者（如艾思奇、胡绳、杨松、张如心、和培元、潘梓年、潘

^① 鲁振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0、651页。

^③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65页。

^④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01页。